



刘少奇对马列学院学员发表讲话

再次，对胜利保有高度的清醒。刘少奇说，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

解答思想疑惑，辩证全面，鞭辟入里。针对当时一些学员担心学习理论会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思想误区，刘少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给予了全面透彻分析，从理论上解开了学员的思想疙瘩。

刘少奇首先说，这种警戒是有好处的，有没有犯教条主义的危险呢？任何时候都有的，今天有，以后还会有。他揭示说：“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总是存在的，要是人们不犯主观主义，就没有唯心论了。一万年以后也还会有主观主义，我们自觉地警戒，就能不犯或少犯。”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说，“但是，如果怕犯教条主义，就不学习了，不进马列学院了，这也有危险性，这叫做经验主义”。刘少奇毫不讳言地指出，现在党内思想上主要的偏向、危险性，偏在经验主义方面的多。不学习就要犯经验主义，而且已经犯了，就是那些怕犯教条主义的人。刘少奇分析道，事情有些为难：不学是经验主义，学了又是教条主义，该怎么办呢？就是要既不是教条主义，又不是经验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可贵就在这里。没有相当艰苦的独立工作，要找到真理，找到正确路线，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的。刘少奇最后总结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犯经验主义，又不犯教条主义。两条战线斗争，这是共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经常进行的、不能离开的”。

批评错误认识，一针见血，不留情面。刘少奇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学习理论上的懒汉思想。他说，有些同志希望多听报告，但有点依赖别人学习的味道。你们的意思好像是说：读过马恩列斯的书的同志，讲给我听，我就可以不读了。这是懒汉的精神，想依赖别人。这种精神，是与共产党员的精神不符合的。共产党员的精神，是积极上进的精神、独立创造的精神。列宁讲过，要认识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认识一个真理，没有相当艰苦的独立的精神和工作是不可能的。必须有自觉的、艰苦的、独立的工作，要自己搜集材料，分析材料，否则要了解真理是不可能的。所以学习主要靠自己。

讲话之前，刘少奇还查看了学员的考卷，在讲话最后，他提醒大家说：“许多同志文化水平不够。要学习理论，文化不够是一个缺陷。因此，为了学马列主义，学习文化是必要的。以你们现在的文化水平看来，要真正学好理论，有许多同志是不够的。有些同志大学毕业，但写的文章就是不通。”讲话之后，学院组织了学习讨论，从学员的普遍反映看，刘少奇的讲话确实触动了学员的思想，是十分有效的。



刘少奇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

□ 谢煜桐

历史的车轮走到了1948年，胜利的天平已经明显地倒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广大人民一边。新的形势与任务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具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为此，1948年7月24日，党中央决定恢复建立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刘少奇为院长。12月14日，院长刘少奇亲自到马列学院对第一班学员发表讲话，深刻阐述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有关问题。刘少奇的讲话，既是劝学，也是训话。这篇讲话的立意，至今读来不觉过时。

劝学马列主义，旁引博证，以理服人。首先，对理论进行阐释。刘少奇指出，“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他坦率地指出，就整个党来说，我们从来就是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因此要“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

其次，对经验进行总结。刘少奇指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同志看了“两个策略”（即列宁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才后悔为什么不早点看，许多问题列宁早已解决了。如果当时看了“两个策略”，从建党、国共合作问题上好好研究，我们就不会在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毫无思想准备。他强调说，我们现在要做到不是事后后悔，而是事前有准备、有研究。

二十四史的《晋书》中，记载有一则关于贪泉的历史故事。东晋年间，广州一带倚山靠海多产“珍异”，可由于“多瘴疫”，人们对这里还是有些恐惧。一些到此任官者，都不愿停留，只想赶紧离开，便上下其手，大举捞取钱财。“贪泉”就在距广州不远的一处名为石门的地方。时人相传说喝了贪泉之水，便“怀无厌之欲”，即会产生无尽的贪婪欲望，即使是廉士亦贪。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这不过是贪官给贪腐行为找的借口而已。

东晋一位到此担任刺史的官员吴隐之，途经贪泉，“酌而饮之”，并赋留一诗：古人云此水，一饮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夷齐”即伯夷、叔齐，是商代两位有操守之士。诗的大意是：古人说喝了此水就会贪图钱财，但若真是伯夷、叔齐这样的人物，是不会改变自己操守的。此诗是作者的表白与自励勉勉。在广州为官期间，吴隐之“清操逾厉”，外人虽议论纷纷，“然亦始终不易”。这样一来，“贪泉”之名，自然被击破了。后来，吴隐之离开广州回到京城，也只住在小宅

院茅草屋里，朝廷的俸禄仅留下自己的口粮，其余都分别赈济亲戚、族人，生活非常清苦，吴隐之将廉洁俭朴之风一直保持到老。

与贪泉相对应，史书上也记载有几处廉泉。其中以陕西汉中的廉泉较为著名，又称廉水、廉津。

《南史》中有这样一段故事，讲当时在梁州（今陕西汉中）任职的参将范柏年，受刺史指派，到京师建康觐见皇帝。宋明帝刘彧问：广州有一处贪泉，卿州复有此水不？范柏年回答：梁州惟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

范柏年在这里提到的，是汉中当地的两条水名：廉泉、让水；两个地名：文川、武乡。这四个名称，廉泉即汉中的廉泉，“让

水”，当在今天汉中中南部区域，“文川”和“武乡”则分别在今天汉中市城固县和汉台区（此诸葛亮封地，人们又称诸葛亮为“武乡侯”）。汉中是著名的汉江源头，大小河流交错甚多，可称颂的地名也不少，但是在范柏年的回答中，他选择了“文、武”“廉、让”这些包含美德字眼的地名、水名，突出了此地文化丰厚、山川秀美的形象。

听到范柏年的回答，宋明帝也起了兴趣。他随即追问一句：卿宅在何处？范柏年答道：臣所居廉、让之间。表层看去，范柏年是说自己的住所任在廉泉、让水之间，其实是隐含着自己具有廉洁忍让的品格之意。这番回答让宋明帝甚为满意，范柏年因此受到赏识，遂被

追忆父辈的足迹

□ 闫会勤

书长、党委委员兼地委书记，华北局党校三部主任，华北革大三部主任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机关党委书记，参与领导了中国人民大学初建的各项事务。不久，就又接受了党委派的新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石油资源，石油工业发展急需专业人才。在这种急迫形势下，我父亲与来自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大连工学院的同志们一起肩负重任、白手起家，克服当时人力、物力、财力上的诸多困难，创建了我国第一所石油大学。从1954年到1963年的10年间，父亲在北京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院长职务。他始终埋头苦干，忠实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创造性地运用解放区办学的经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曾多次带领师生到大庆油田实地学习、调研。

1964年以后，父亲被调到中央党校二部任副主任。“文革”期间，在干校劳动时不幸患了脑血栓，因未能得到及时的医治，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党校复校后就没有能再回到工作岗位上。

三

现在回忆起小时候父母亲的事情，我的很多印象都是零散的。尽管自从1950年父亲把我从农村接回了家，我就一直生活在他们身边，但那时他们的工作非常繁忙，常常是早晨我们几个孩子还没起床，他们已经上班去了，晚上入睡时他们还没有回来。初中、高中我一直住校。1969年3月，响应毛泽东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我去了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而父亲到了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我们又分别了20多年。

在家的时候，母亲亲谈及他们曾经的革命工作也并不多，很多事情都是我间接知道的。20世纪60年代，有一部电影《红旗谱》就是描写冀中平原滦沱河畔几代农民群众在党的组织领导下，与地主恶霸进行一场场激烈的斗争，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故事。影片中的主人公朱老忠的扮演者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崔嵬，他扮演的朱老忠粗犷豪爽，正义凛然，表现出中国农民英雄的铮铮铁骨与耿耿正气。有一天，我竟在家中见到了崔嵬本人，原来崔嵬在冀中“火线剧团”时我父亲是他的领导。另外，我还知道了影片中那个启发和组织农民群众的小学教员，是以我父亲的经历为素材的。2002年，我在西柏坡革命展厅里，看到父亲的名字在“全国土地会议名单”上。

与父亲相比，小时候母亲照看我们的时间稍多一些。我母亲叫田雪林，1938参加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做妇女工作。曾参加“妇救会”及“锄奸队”的对敌斗争，母亲很勇敢，参加过打鬼子的战斗，曾用大刀亲手处决过汉奸。一次完成任务撤离时从高墙上跳下，腿磕在石头上，把膝盖下的迎面骨摔断。她的腿上留下了因未能接好而隆起的骇人的伤疤，额头上有敌人的子弹擦过的疤痕。母亲后来又把我舅舅从家里带出来参加了革命。我还听过母亲讲我出生时的故事：我快要出生的时候，我方部队与傅作义兵团还时有交战。就在紧张的战斗与行军途中我出生了，母亲因为产褥热、产后风昏死过去，刚出生的我也没有哭声，急得战友们手忙脚乱抢救大人，而我半天没有声音，大家都以为孩子死了就准备埋掉。多亏一位女军医，她发现我还有一口气，就倒提起来拍了又拍，我才终于哭出了声。母亲对我说是战友们救了我们母女的命。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温和，从来没有高声训斥过我们，但是他在我们心中有种“不怒自威”的感觉，我们都很听他的话。在外人眼里，父亲是位亲和的长者。在石油学院创建和发展阶段，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

期，为解决教职工的生活问题，他常常下食堂，和炊事员一起想方设法让学生吃饱吃好，许多同学都吃过他盛的饭菜。当年《光明日报》曾刊登过在北石学生中流传的一段顺口溜：“下罢课，进食堂。炊事员，打菜忙。豆腐白，鸡蛋黄。量真足，菜真香。一抬头，是院长。学生接过一碗菜，犹如领过一份奖，心里顿时暖洋洋。”父亲在师生的心目中是“至亲长者”。这在上世纪末，在吴仪副总理（时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那里得到过验证。吴仪在石油学院学习期间，父亲是她的老师和院长。后来吴仪到中央党校学习，曾到校医院看望我的父亲。我目睹了他们师生亲切感人的会面经过。在父辈们的艰苦奋斗下，北京石油学院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为我国的石油工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记得还有位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同志到家中看望父亲，他就跟我讲到，当年他原是想报考航空航天大学的我父亲得知后对他

说：航空航天器是先要有动力燃料啊！来石油学院吧。他觉得父亲的话特别有道理，于是真的就报考了石油学院，他一直以这个选择为自豪。

四

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对在外地的北京知青有了返京的新政策。因我父母年近多病需要子女在身边照顾，党校领导给予了理解和帮助，于1990年10月将我调入中央党校工作，我开始和父母亲生活在一起照料他们。我父亲从患病到去世的二十几年中，从没有对生活中的波折及病痛抱怨过，他总是积极乐观地面对，坚持锻炼，坚持读书、看报，并天天晃动身体带动残手，坚持摘录书报中的重点内容。他始终坚信我们的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一切困境，走向更加光明、繁荣的未来。

在父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我的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工作都比较早。我的大姐很小时就去了延安，在延安保小学习、生活，参加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她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毕业后，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工业，并留校做了一名人民教师。2015年她和我舅舅一同获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战老兵”勋章。我的大哥在河北老家十一二岁就参加了革命，十五六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到北京的一所石油学校（大专）学习，后成为石油战线上的一员。我的二哥从北京101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先后从事过与军事、国防相关的工作。我本人1973年离开内蒙古建设兵团后，先后在石油部地球物理勘探局的仪修厂、石油部管道局做过普通工人，担任过子弟学校的老师，在外地工作生活了近30年。1990年回到北京成为中央党校的一名图书馆管理员。虽然能力有限，但是我干一行，就努力做好一行，我始终记得母亲对我说的话，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我要做好工作对得起国家。

时光过得真快，一晃我们这一代人也都已步入了古稀之年。每每回顾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艰难历程，回忆起父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的心中都充满敬意，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我们要把红色基因因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教育孩子们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学习他们热爱祖国、艰苦创业的精神，努力掌握本领，建设国家、造福社会。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贪泉与廉泉的启示

□ 杨建民

水”，当在今天汉中中南部区域，“文川”和“武乡”则分别在今天汉中市城固县和汉台区（此诸葛亮封地，人们又称诸葛亮为“武乡侯”）。汉中是著名的汉江源头，大小河流交错甚多，可称颂的地名也不少，但是在范柏年的回答中，他选择了“文、武”“廉、让”这些包含美德字眼的地名、水名，突出了此地文化丰厚、山川秀美的形象。

听到范柏年的回答，宋明帝也起了兴趣。他随即追问一句：卿宅在何处？范柏年答道：臣所居廉、让之间。表层看去，范柏年是说自己的住所任在廉泉、让水之间，其实是隐含着自己具有廉洁忍让的品格之意。这番回答让宋明帝甚为满意，范柏年因此受到赏识，遂被

任以朝廷内外要职。

由此“廉泉让水”也流传为一句成语，收入辞典，其意原喻为官廉洁，后也比喻风土习俗淳美。

从后来的情况看，范柏年绝非仅仅“善答”，他的作为，也显现了其“文、武”“廉、让”的能力及品行。在范柏年任梁州、南秦州二州刺史时，晋寿郡（约今四川广元南部）的李乌奴起义，联系白水郡（约今四川广元西北）的氐人合兵攻打梁州。范柏年一面积极应战，一面极力劝说叛军归降，最终李乌奴归降，成了梁州的一员州将，既避免了一场血战，又守护了家园，给了一方百姓安宁。魏晋时期，政权交替多变，范柏年始终以廉洁自

处、不阿权贵，后因招致齐武帝宠信的权臣胡谐之嫉恨，被逼自杀。范柏年的大名至今仍在汉中一带传诵，人们称颂他，不仅因为他夸赞了当地山川风物，提升了本地的文化品质，更是对其清廉品格的高度赞许。

贪泉和廉泉的故事之所以流传千古，是基于人们对廉洁风骨的赞赏。饮贪泉之水而不贪，说明人自身的操守内持对于为官清廉甚为重要；居廉泉让水之间，则体现了清廉为官需坚守的方正君子之风。廉泉示人以榜样，贪泉给人以警示，值得今天的人们仔细思量。

